

【一般论文】

新加坡义顺地区华人聚落的起源与演变 (1819-1991)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Settlements in Yishun, Singapore
(1819-1991)

倪伟伦* (上海复旦大学)

William Ni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Email: williamwarm@foxmail.com

Published online: 30 JUNE 2023

To cite this article (APA): Ni, W. (2023). 新加坡义顺地区华人聚落的起源与演变 (1819-1991) :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Settlements in Yishun, Singapore (1819-1991). *ERUDIT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ducation*, 4(1), 1–21.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4.1.1.2023>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4.1.1.2023>

摘要

近年来, “甘榜精神”¹ (kampong Spirit) 被视为新加坡华族文化的根基, 李显龙总理也多次强调 “重塑甘榜精神” 对于新加坡社会的重要性。 “甘榜精神” 诞生于早期的新加坡华人聚落, 也是特定的历史、地理、人文、政治环境等综合要素催生的产物。 本文从历史聚落地理学的独特视角, 结合地图及档案史料, 运用人地关系理论以早期新加坡义顺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华人聚落作为案例, 来探讨近代新加坡华人聚落的起源、基本特征及其发展演变规律。 早期华人聚落的起源依托于19世纪末实里达流域的人地关系背景; 南下移民潮与新加坡开埠以来的莱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2019 级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历史地理、聚落地理、医学史、海外华人移民史等。

¹ 甘榜是马来文 Kampong 的华文音译词, 意思是乡村、村落、村庄。 昔日的甘榜精神 (kampong Spirit), 就是现在所指的社区精神, 意指生活在同一个社区的人, 守望相助, 无私奉献, 形成一个相互包容的大家庭, 从而具备强大的社会凝聚力。

佛士重商政策也是聚落起源的重要宏观环境支撑；义顺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资源刺激了种植经济的蓬勃发展，这些因素的叠加推动了移民垦殖区的开发，最终形成了将血缘、地缘、业缘与方言缘等多缘结合的华人村落。1965年新加坡独立前后，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居者有其屋”的执政党惠民政策的双重影响，传统华人聚落逐渐被现代组屋社区所替代，从而完成了聚落的时空演变过程。

关键词：新加坡华人、义顺地区、乡村聚落、时空演变

Abstract

The kampong spirit is regarded as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Singapore, and 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 has repeatedly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reshaping the kampong spirit" for Singaporean society. The "Kampong Spirit" was born in the early Chinese settlements in Singapore, and it is also the product of comprehensive factors such as specific history, geography, humanities,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From the uniqu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settlement geography, combined with maps and archives, this paper uses the theory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to discuss the origin,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ettlements in modern Singapore by taking the representative Chinese settlements in the Yishun area of Singapore as a case in the early days. Evolution. The origin of early Chinese settlements wa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land in the Seletar River Basin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southward immigration wave and the Raffles business policy since the opening of Singapore were also important macro-environmental supports for the origin of the settlements; the unique physical geography of the Yishun area Resources stimulated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planting economy, and the superposition of these factor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immigrant settlement areas, and finally formed Chinese villages that combined blood, geography, industry and dialect ties. Before and after Singapore's independence in 1965, due to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double influence of the ruling party's policy of "home ownership" to benefit the people, traditional Chinese settlements were gradually replaced by modern HDB communities, thus completing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of settlements.

Keywords: Singapore Chinese, Yishun area, rural settlements,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聚落”一词，在《辞源》中是这样定义的：“聚，谓村落也，为人所聚居。”；“落，所居之处，如部落、墟落、聚落、村落”。聚落指人类各种形式的居住场所，在地图上常被称为居民点²。作为历史聚落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它是人类活动的中心，聚落不仅是房屋的集合体，还包括与居住地直接相关的其它生活设施和生产设施，其自身具有一定的时空演变规律。聚落地理学成为人文地理学的一门子学科，重点探讨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背景的关系，而历史城乡人地关系及其动态演化则是历史聚落地理研究的前沿趋向。

新加坡殖民地时代，华人移民在义顺地区实里达河流域建立起一个个聚族而居的村落，这些早期的聚落带有强烈的华族儒家传统文化特征。本文主要根据地图、档案、会议记录、田野调查和访谈等资料，考察来自华南的闽、粤、琼地区的各个族群如何运用祖籍地的血缘纽带和文化资源，在新加坡建构血缘、地缘和业缘及方言缘多缘结合的华人聚落的历史过程，并根据多个研究个案，讨论聚落的起源、发展以及时空演变的相关问题。

一、近代义顺地区华人聚落的起源

1、19 世纪中叶——20 世纪初“下南洋”移民浪潮的时代背景

1860 年代到 20 世纪初，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动乱、经济凋敝、民不聊生。而当时的东南亚一带却得到殖民地政府的积极扶持，除了传统的农业开垦、采矿业外，航运、商品加工、金融、制造等新产业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空前发展，由于急需熟练劳工，华人劳工为主体的海外移民潮随即出现，大量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华工”以契约制南下出国，即以出国后的工资为抵押，换取出洋费用，时称“契约华工”。到 20 世纪前期，先后约 500 万华工被贩运出国。其中，约有 200 万华工被送往东南亚，主要集中在印度尼西亚、马来亚、新加坡的种植园和以锡矿为主的矿场。

根据前南洋大学历史系的华族村史调查报告³，新加坡义顺地区的海外移民与中国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相关。那一时期的中国，列强入侵、军阀混战，政治腐败、天灾人祸、经济衰退，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广东、福建、海南等地的客工

² 王恩涌，赵荣，张小林等，《人文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页 219。

³ 1969 年 9 月，由当时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师生组成的华人村落调查小组曾在义顺社区的华人村落进行社会调查，并撰有调查报告（油印本）。

纷纷背井离乡南下谋生。

义顺地区最早的原住民，是实里达海人（Orang Seletar），他们也被称为河流中的游牧民，在新加坡北部的老海峡沿岸和实里达河河口（Seletar River）生活和狩猎。虽然他们大多住在船上，但他们主要还是从海岸和红树林获得食物。直到1840年代，新加坡岛南边的廖内群岛发生华人私会党的暴乱，大批岛民向外逃离，其中有部分华人在一名潮州人 Neo Liang Quan 的带领下，到实里达河流域避难，这也是最早有华人踏足义顺地区的记录。19世纪中叶，义顺地区垦殖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批中国南下华族移民。因栽种经济作物，保养园丘以及采收作物等都需要大量劳工，居住在义顺实里达河口及周围的人口，均以甘蜜、胡椒的种植劳工为主。这些劳工多是契约劳工，由园丘主提供膳宿，未偿还债务的，并无工资，需待三五年偿还卖身债后始有工资，这也是十九世纪契约劳工的境遇。根据1969年南洋大学历史学系对义顺地区兴利芭农村聚落所做的调查，他们当中许多人来自福建泉州南安县，村民说着土音奇重的南安方言。除了福建籍以外，义顺地区的南来移民还包括潮州、海南籍等主要方言群。

2、义顺地区的地理与资源条件

新加坡毗邻马六甲海峡南口，北有柔佛海峡与马来西亚相隔；南隔新加坡海峡与印尼廖内群岛的巴丹、民丹诸岛相望；东连南中国海；西南则与印尼苏门答腊岛为邻，扼控马六甲海峡东口，位处沟通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重要孔道，是东南亚航运上的重要港口。由于属于赤道雨林季风性气候，常年深受海风调节，高温多雨，⁴雨水侵蚀甚剧，因而境内高地的表土皆呈红色；沟谷和沼泽地，则属新冲击土层，色泽暗褐，较为肥沃。⁵义顺地区的实里达河口一带恰好属于沼泽地带，为其农业开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资源优势。1824年，新加坡驻扎官（Resident of Singapore）约翰·克劳福（John Crawford）曾提出，棉花、甘蔗、靛蓝、可可、桑树、菸草、豆蔻和丁香等作物，都不适种于新加坡的红壤，本地的气候与沼泽地带土壤最适合栽种热带水果，如椰子和凤梨等。另外，甘蜜和胡椒则是唯二适合本地环境的最佳经济作物。由于这两种香料的市价较好，刺激农民大量种植，1834年，甘蜜与胡椒开始成为新加坡输往英国的重要商品，其中尤以甘蜜，为一种治疗赤痢很有效的药物。

⁴ 邹豹君，《马来亚地理》（台北：汉明书局，1965），页62。

⁵ 梁德儒，《新加坡地理》（新加坡：大地出版社，1966），页6。

垦殖园的选址与地理条件密切相关，需要靠近集市，方便交易；此外，邻近码头对于货船运输物资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华人种植业的先驱者意识到河流的长短及河口的地理位置是关键要素。他们优先选择郊外主要河流流域的丘陵地带发展甘蜜胡椒园。他们以较长的河流作为交通要道，并把上游一带发展为小市集，为甘蜜、胡椒及米粮日用品的集散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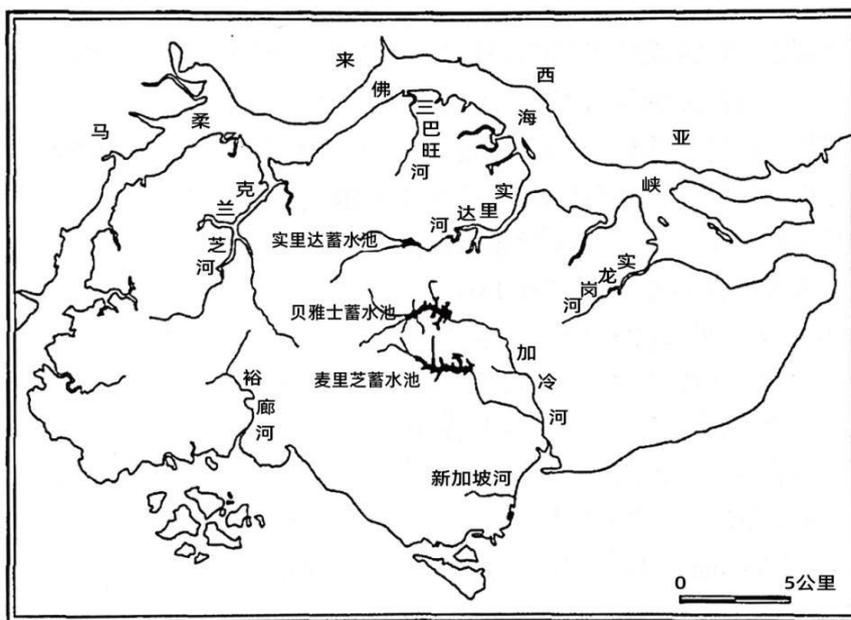


图1 新加坡河流分布图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黎敏斐《马来亚地图集》底图改编绘制。

新加坡岛屿面积狭小，地形平缓，最高点为新加坡岛上的武吉知马丘陵，海拔高度为 163.63 米。受地形所限，河川多流短水缓，共有 32 条主要河流，加起来共 93 公里长。此外，由于受到中央地势较高的影响，河川流路呈现放射状水系，较大的河川有西北部的克兰芝河、西南部的裕廊河，北部则有三巴旺河、实里达河、榜鹅河、实龙岗河等。南流入海的则有加冷河，市区内则有新加坡河、梧槽河等虽然河流不长，但都能通舢板小舟，对货物转运起卸，实为方便。⁶

义顺地区的实里达河长约 14.5 公里，是全岛第一长河。自然其河流沿岸逐渐被开发为甘蜜与胡椒等作物种植园规模性的集群。由于实里达河川下游多为三角江地形，致使河口宽广且水深，适合舢板舟楫的往来，方便货物的运输。图 1 显示，早期义顺地区垦殖园的经济作物通过实里达河从北向南，再通过加冷河与新加坡河转运到新加坡港口，形成了贯穿全岛航运的主要交通命脉。由此不难看出

⁶ 郑资约，《东南亚地理志略》（台北：正中书局，1972），页 361-364。

出，义顺地区地形、气候与土壤等自然条件，为其农业垦殖区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地理条件支撑。

3、移民垦殖区的形成

19 世纪以前，实里达河两岸还是原始森林，这里聚居着原住民“海人”（Orang Laut），他们以舢板船为家，沿着实里达河沼泽捕鱼及运载甘蜜。实里达区域泛指北部地区的“三巴旺”和“义顺”。1811 年，柔佛廖内王朝大臣天猛公移居新加坡之后，逐渐一些“下南洋”的华人客工也跟随着迁移而来，南下华人逐水而居，再沿河而上，开垦荒地建设甘蜜与胡椒种植园。甘蜜在当时的欧洲工业革命浪潮中，可作为纺织和皮革的染色原料，极具经济价值。当时的土地管理权还属于天猛公，他将码头附近建设聚落的地方叫“港脚”⁷，拥有开发准证的叫“港主”，种植园所在地则按港主姓氏来命名，例如蔡厝港、林厝港和杨厝港，陈厝港、曾厝港、刘厝港及巫许港等众多甘蜜园。

曾厝港是当地华人对实里达的代称，当时的港主是广东潮籍人曾亚六（Chan AhLek, 1813-1873），他在 1850 年买下实里达河支流 44 亩（约 17 公顷）土地开辟甘蜜园，只有 35 名“苦力”（员工），是当时最小的“港脚”⁸。这个 44 亩的“港脚”，就是现在三巴旺路和万礼路交界的地方。曾亚六去世后，他的妻子曾英娘接管土地，直到 1909 年她将土地卖给林义顺。

⁷ “港”在汉语闽南方言中指水道，“脚”指尾端，“港脚”即指上下船的所在地。港脚多以开发当地的地主命名。例如实里达河上游的港脚，当时称为曾厝港（chan chu kang）。

⁸ H.W. Firmstone, *Chinese names of streets and places in Singapore and the Malay Peninsula* (Singapore: National Library Board, 1905)



图2 曾厝港第一份地契（1850年由曾亚六持有）

资料来源：《从图片看义顺区发展》，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1850年至1880年间,实里达河流域以发展甘蜜业和胡椒业为主,在河的下游以东、以西以及河的上游地区形成三大种植区,是当时新加坡甘蜜与胡椒主要出产地之一。⁹由于加工业生产产品增加以及由此带来的商品流通需求,在当时交通要道实里达河上游形成商品集散地,即“港脚”。随着“港脚”的日益繁荣,其逐渐由早期的商品集散地变成繁荣的商业市镇。随着实里达种植经济的迅猛发展,移民垦殖区陆续形成,华族企业家希望吸纳劳工在靠近园丘与加工工厂的地方定居,从而保证长期劳动力的稳定性。随即,一些劳工们在原始森林垦辟土地,种植甘蜜、胡椒或黄梨、树胶。由于树胶生产期长,在种好树胶树苗后,有些工人离开了园丘,有些则留下来继续作为园丘工人,住在园丘内园丘主用亚答叶及木板建的简陋宿舍“万栅”(bangsal)里。以“万栅”为家的劳工多是单身汉。有家眷或准备回中国娶亲的华人,则在胶园边缘用亚答叶和木料搭建房屋安居下来¹⁰。这些有了自己简陋安身之处的华人,除了在胶园与胶厂做工,也种些果树蔬菜和畜养家禽,称为“做芭”。因此,早期的垦殖区附近的劳工宿舍聚集区也就逐渐发展成为近代义顺地区华人聚落的雏形。

⁹ 林源福,《义顺社区发展概述》,载《义顺社区发展史》,新加坡义顺区发基层组织、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馆编撰,新加坡:国家档案馆,1987年。

¹⁰ 林孝胜主编,《潘家村史》(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1)

4、开埠以来的华商经济发展

新加坡于 1819 年开埠后，莱佛士的重商政策吸引了各国贸易商纷至沓来，其中包括来自马六甲和中国的华商。华商从事的行业是多元化的，主要有贸易、航运、烟酒、种植、采矿、房地产等。经营种植业的华人企业家从海峡殖民地政府领得地契，获得土地开发权，然后雇工开垦。华商们同时也设置工厂加工甘蜜、胡椒、黄梨和树胶，输往国外。

张永福、陈楚楠、陈嘉庚和李光前等实业家都曾经营橡胶和黄梨园丘。除了种植橡胶和黄梨，他们也开设工厂将它们加工成商品售卖，其中更有人凭此建立巨大的商业王国，被冠以“橡胶大王”和“黄梨大王”的称号。陈杞柏是第一位大规模种植黄梨者，他是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之父。早在 1894 年就在柔佛地区购买数百亩土地开辟成黄梨园，并创办日新黄梨厂，从事黄梨罐头制造业。¹¹1901 年陈杞柏又买下位于义顺地区华顺芭路口的三座黄梨园，面积约 100 英亩，之后由其子陈嘉庚继承。当时日新厂所生产的黄梨罐头占黄梨总出口贸易的 70%，其“苏丹牌”罐头十分畅销。¹²

林义顺(1879-1936)，是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上叶新加坡著名的华商侨领、潮帮以及华人社会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也是新加坡的潮人先贤，他对新加坡早期的拓殖事业以及当地华人社会的经济建设和潮人社群的凝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特别对于新加坡的三巴旺区的开发，贡献尤大，新加坡的义顺区、义顺新镇、义顺路、义顺环路、蔚华路、顺岬等，都是为了纪念这位先驱而命名的。1919 年林义顺与人合资创办的“通益号”(Thong Ai)即位于实里达路，其工厂的主要功能是将橡胶乳胶(latex)转为橡胶薄片(blanket sheets)以出口。到了 1920 年，这间工厂转变成为全面性的橡胶加工厂；由于橡胶加工业是劳力密集的产业，因此林义顺的工厂也为邻近的居民提供不少就业机会，对早期新加坡西北部地区的乡村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直到 1929 年，由于世界经济衰退，橡胶价格大跌，滑落到每磅 3 角 4 分，1932 年继续跌落到每磅 7 分。迫不得已，林义顺将通益胶厂交给李光前接管，此后林义顺之子林国忠与李光前合资成立南益树胶有限公司(Lee Rubber Co.Pte Ltd)。

¹¹ 曹宝弟，《战前星马黄梨业的探讨》，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荣誉学士论文，1976 年，页 19。

¹² 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中文版）》（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3），页 352。

二、近代义顺地区华人聚落的基本特征

1、血缘、地缘、业缘、方言缘 的多缘特征

1819 年新加坡开埠之后，南来的闽粤移民在义顺地区，运用祖籍地的血缘纽带和文化资源，先后建立起财启村、黄梨山村、泽光村、直鲁殊村、柑仔园、合春格村、海南村、苏家村等一大批华人聚落，形成了宗亲（血缘）、同乡（地缘）、行业（业缘）、方言缘等多缘交织的特点。经营种植经济的华人企业家大多喜欢雇佣与自己具有同一地缘、方言缘的华人移民。早期在实里达河流域经营甘蜜和胡椒业的华商多为潮州人，例如兴利芭的大部分土地原属潮籍企业家苏添富的树胶园，其员工多为潮籍和海南籍华人；福建闽南籍的陈泰、陈嘉庚和李光前等也跻身黄梨、树胶行业，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在他们的胶园和胶厂工作的多数是福建闽南人，由于李光前的祖籍是福建南安，因此 他更偏爱南安籍移民劳工。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实里达河流域的雇主们出现了福建南安籍劳工的旺盛需求；海南籍的劳工被迫移居到兴利芭西南部另建家园，后来逐渐形成海南村；潮州籍劳工则移居到兴利芭的西北部一个叫三百浔的地带，靠在实里达河捕鱼为生。

这些由华南移民建立的华人村落有不少是聚族而居的单姓村，“潘家村”亦是其中一个新加坡殖民地时代华人移民建立的聚族而居的具有代表性的村落。潘族移民的祖籍地在中国福建南安乐峰乡炉内村，其村民被称为“炉内潘”，来自华南的“炉内潘”族人，在新加坡的义顺地区逐步建构出血缘、地缘和业缘三缘结合的“潘家村”特色。据前南洋大学历史系的资料，1969 年他们调查了居住在“潘家村”的 72 户村民，其中“炉内潘”58 户，占 76.3%，安溪卓姓 3 户，占 3.9%，黄姓 4 户，占 5.2%，其他杂姓 7 户，占 9.2%¹³。也就是说，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潘家村”的四分之三以上村民仍具有紧密的血缘联系。“潘家村”的绝大多数村民不仅有着相同的地缘和血缘特质，其经济活动也带有明显的职业相同特点（业缘），比如作为园丘工人，在陈嘉庚的新利川黄梨罐头厂和李光前的南益树胶厂工作，以及在兴利芭中部低地种植果蔬或饲养家禽等。每当园丘扩展规模缺乏工人时，族人便介绍家乡的亲属亲戚来填补，兴利芭内的“炉内潘”人因而不断增加。移民海外的“炉内潘”人，在新加坡兴利芭重新聚族而居，建立了一个地缘、血缘和业

¹³ 前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村史调查报告，《绝后岛杨家村》等。

缘三缘结合的新社区。

2、庙宇宗祠是儒家传统文化体系的重要标志

庙宇宗祠在新加坡华人社群中，特别是在早期的移民社会，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并非只是纯粹宗教信仰和膜拜的场所，同时也有团结同乡、提供福利和管理协调社区事务等社会功能。此外，还有许多庙宇和方言会馆组织结合，为其同乡提供方便，早期的福建会馆和海南会馆即是明显的例子。这些古老的华人庙宇从建立到演变，凝聚了南下先贤的血汗，折射出先贤们艰难创业的历史。19世纪中叶，在义顺地区的每个华人村落里基本上都设立了庙宇或者宗祠，比如当时的义顺地区华顺芭，开始以两间庙为中心，渐渐发展成两个社区：一是以芭尾华顺宫福德祠为中心的直鲁殊村；另一个则是以元寿堂五谷仙帝庙为中心的黄梨山村，靠近实里达路。¹⁴华顺宫福德祠的建立揭示了农村社会对大伯公（即福德神或土地神）的景仰，希望神灵保佑合境平安。它也同时成为这里早期社区活动的核心组织，起着“藉神道以融洽众心”的社会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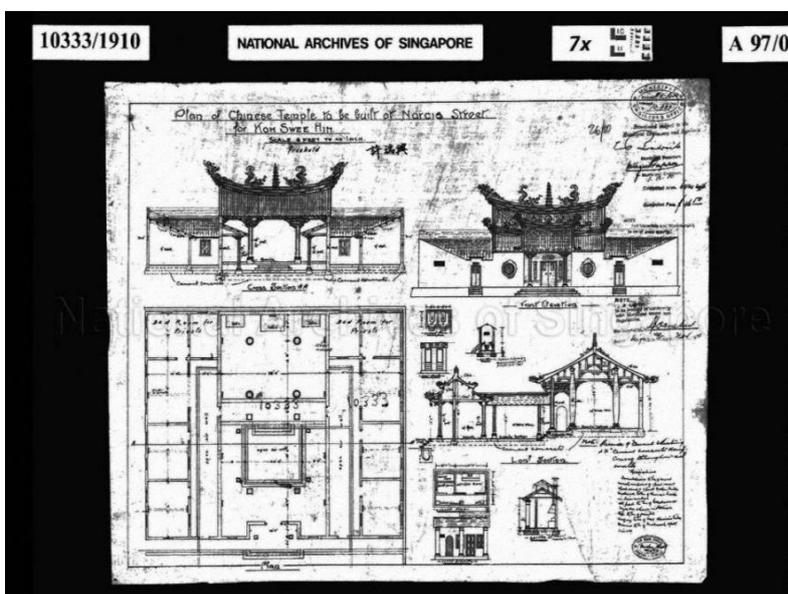


图3 华人庙宇建筑图（1910年）

资料来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编号：10333/1910

¹⁴ 林源福，〈战前华顺芭的经济与社会〉，载《义顺社区发展史》，新加坡义顺区发基层组织、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馆编撰，新加坡：国家档案馆，1987年。

在义顺兴利芭潘家村也有一座庙宇称为横山庙。该庙供奉有主神潘府大人和配神陈李两将军。“炉内潘”人认为，潘府大人即明朝的工部尚书潘季驯，他被尊称为“祖叔公”，又称为“祖神”。横山庙不但是“炉内潘”人的精神文化凝聚中心，同时也负责管理“潘家村”这个新社区的日常事务。“潘家村”的管理机构是横山庙理事会，实行董事制，董事会设主席，下设总务、财政、文书、查账和交际各股，各股设正副股长各 1 人，另设 12 人评议员。董事会职员由理事会投票选举产生¹⁵。它仍旧延续了中国农村传统家族组织——宗祠委员会的基本社会功能，也是华族儒家文化的具体体现。横山庙还是“潘家村”族产拥有者与管理者，作为“潘家村”的经济中心，同时也具备一定的经济功能。

3、乡村华校是华族聚落尊师重教的文化象征

华裔首领林义顺早在 1919 年便在港期附近相仔园路口设立发初学校（培英学校的前身），为胶工及邻近村民子弟提供小学教育，开义顺区教育之先河。培英是义顺区最早的一所学校，它为义顺区培育许多英才俊杰；如潘家村的两位数理科博士潘江湖和潘枚喜，著名留法画家黄奕全，中学校长黄淇茵和青年歌唱家蔡慧昆等。此外，义顺区的社区领袖或商界成功人士，他们的启蒙教育多是在培英学校完成的。

三十年代中期，由于涌现了一批热心教育的地方领袖，除林义顺和李光前外，还有蒋壬江、林尚、潘南山、陈树泉、黄仁义、蒋德九和许自炳等华裔，义顺区的小学教育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这段时期成立的华文小学计有港脚的启智和实里达公学、兴利芭的杏墩、华顺芭的华顺和时期成立的财启村的励正与广德。在义顺直鲁殊村，当时落户于此的农户大都是有家庭的。孩子长大后需接受教育，而且村民都牢记着“养不教，父之过”的祖训。因此当华顺宫福德祠落成后，村里的潮籍村民在 1935 年在庙边空地搭起亚答校舍，建立了华顺学校，聘黄侨生为校长，招收村里子弟就读。新加坡实里达律（洪水港）十条石有华校一所，名为实里达公立学校，是李玉麟（李光前之兄）于 1936 年独资创办。该校名为公立实则义务性质，学生免费。实里达公立学校，可以说是一间典范的乡村华校，亦成为华族优良传统的表征。当时遍布各村落的华校的校舍都很简陋，一般是亚答木板屋或石棉木板屋，各学校的规模都很小，根据 1969 年调查，人数最多的华校是培英，它设有总分校，学生达 925 名，其次为实里达公学，共有 428 名学

¹⁵ 《横山庙理事会会议记录》，1957 年 3 月 31 日、4 月 7 日。（会议记录为手抄本，现存横山庙董事部）。

生，其余都少过四百名学生，其中敬文学校仅有学生 120 名¹⁶。1950 年，英国殖民地政府才在十年教育计划下，兴建了本区第一间英文小学—三巴旺学校。1954 年政府又在义顺路创办义顺学校。这两间英校的学生人数都在千名以上，而且都是现代化建筑物，内部设备亦较完善。

三、近代义顺地区华人聚落的时空演变

1、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

1819 年殖民时期以来的莱佛士城市发展，很快将岛屿南端的新加坡河口一带开发为人口密集、商业鼎盛的市区。但伴随着农业垦殖业的开拓，以华人为主体的大量移民纷纷涌向新加坡郊区，在全岛各地的原始丛林开芭辟园，郊区集镇、村落聚落也因此逐渐延伸至岛上各地。当时的乡村范围约一百八十三平方英里，而以农业垦殖园占地最广。多数分布各地的乡村集镇，坐落于主要公路沿路一带，大都作为以农产品和消费品的集散中心。¹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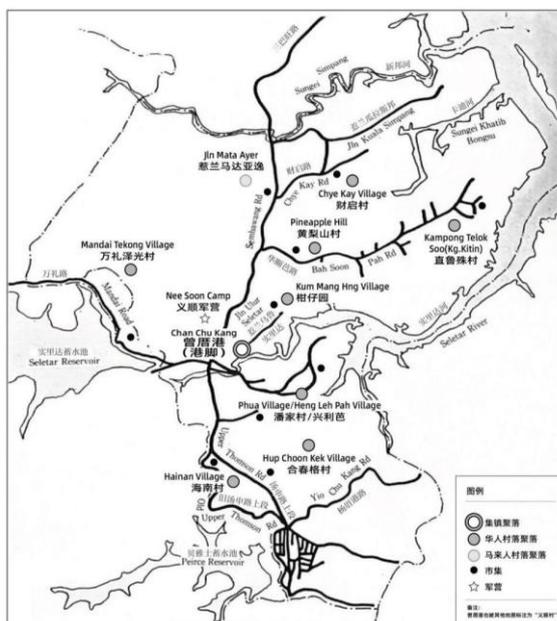


图 5 义顺地区华人聚落空间分布图（1960-1970 年）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义顺社区地图为底图绘制

¹⁶ 林源福、鄂史昌，〈义顺区教育发展概况〉，载《义顺社区发展史》，新加坡义顺区发基层组织、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馆编撰，新加坡：国家档案馆，1987 年。

¹⁷ 梁德儒，《新加坡地理》（新加坡：大地出版社，1966），页 50。

图 5 附表 义顺地区华人聚落层级、类型、空间区位统计表 (1960-1970 年)

层级	类型	指标	空间区位	名称	主要特点与功能	数量
一级	集镇	交通区位、河流水文、社会经济	中部	曾厝港 (义顺村)	具有货物集散的功能, 包括农产品的输出以及周围农业垦殖园生活生产物资的输入。商铺集中区, 农产品加工工厂集中。	1
二级	村落	气候、土壤、地形地貌、人口移民、农业生产方式、交通区位、传统文化	北部	财启村	早期的村落由农业垦殖园演变而来, 大多数的村民是园丘工人, 他们住的房屋是园丘内的万栅 (劳工宿舍), 随着劳工数量增加, 家属日益增多, 他们落户在园丘周边, 形成村落聚落, 他们主要从事园丘种植工作, 同时也涉及农业养殖等行业。	8
				黄梨山村		
				柑仔园		
			西北部	万礼泽光村		
			东北部	直鲁殊村		
			东南部	潘家村		
				合春格村		
南部	海南村					
三级	市集	交通区位、人口移民、农业生产方式、社会经济	北部	财启村市集	随着村民人口的增加, 几乎每个村落通往集镇或者大路的主干道边, 村民都会搭建一些商铺做一些日常生活所需的小生意, 方便那些不便到集镇采购物资的乡亲。	10
				黄梨山村市集		
				柑仔园市集		
			西北部	万礼泽光村市集		
			东北部	直鲁殊村市集		
			东南部	潘家村市集		
				合春格村市集		
南部	海南村市集等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林源福等主编, 《义顺社区发展史》, 新加坡: 国家档案馆, 1987 年; 林孝胜, 《潘家村史》, 新加坡: 亚洲研究学会, 1990 年; 《义顺区兴利芭东南亚华人史调查报告》, 南洋大学历史学系, 1969 年等资料考证统计。

通过以上对义顺地区的乡村聚落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总体上，新加坡早期乡村聚落以集镇为中心，村落、市集聚落呈网状散落在集镇周边，从而形成了三个层级分布的聚落空间分布特点。需要注意的是，集镇作为区域内的中心，承载着货物集散的重要功能，早期的集镇为方便郊区的农业垦殖园物资配送，因此一般选择在河流口岸。而乡村村落内的村民大多数为农业垦殖园的园丘工人，因此，村落聚落的设立一般都环绕在垦殖园周边，方便园丘种植和管理。同时市集的设立一般也都在主要干道附近，这些都说明交通区位的考量是郊区聚落空间分布的主要指标。除此之外，河流水文、气候、土壤、地形地貌、人口移民、社会经济、农业生产方式等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也都是聚落设置的必要条件。

2、村落形态与民居样式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农业垦殖园助长了义顺地区乡村的发展，随着山芭拓荒，道路改善，乡村聚落增加起来，逐渐吸引了更多外来移民。财启村位于三巴旺十二英里，介于新邦奇立河与卡迪蒙苏河之间。19 世纪初，潮州籍的陈财家在 18 岁时，从中国南来新加坡，落户于义顺港脚（万里路与三巴旺路的交界处），起初他在胡椒与甘蜜园工作，后来他又在义顺港脚开始经营酒庄生意，经过多年的努力，买下了成邦园的两个树胶园以及位于华顺芭的一个黄梨园。据陈财家的儿子陈木喜追述：早年乡村没有名字，乡政局为处理信件需要邮寄地址，基于其父亲陈财家是一位热心助人，被大家所尊敬的园主，故推荐以陈财家的英文名字“Chye Kay”作为村子的命名。1954 年殖民地政府正式采用“Chye Kay Village”作为村名。至于“财启”中文名，则是取其“有土始有财，有财就会启”的含义。¹⁸

¹⁸ 黄耀天，《梦里家乡：财启村》（新加坡：Oxford Graphic Printers Pte Ltd., 2018），页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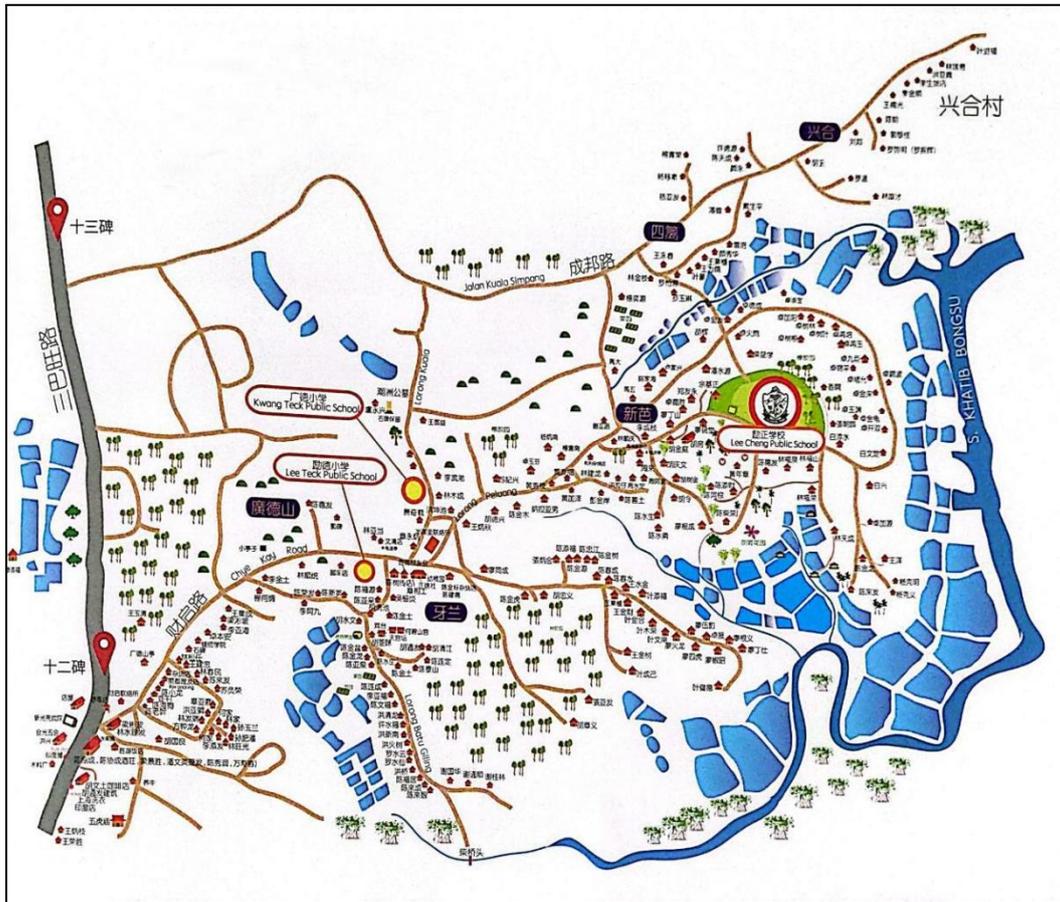


图6 财启村村落空间分布图（1960年代）

资料来源：财启村原 200 位村民委托《梦里家乡：财启村》出版。

财启村村落形状大致呈一个长方形，全村划分为村口、前段、中段、北段、村尾。村内有五条小马路：财启路、罗弄白浪、罗弄峇都吉林、罗弄阿查拉、惹兰瓜拉新邦。前段位置有联络所，村口除了有些小百货商店，还有间创办于 60 年代初新光亮戏院，是早期村子唯一的娱乐场所。简陋的露天戏院，两旁围着 9-10 尺高锌板片和洋灰地除了正门入口处，戏院左右两侧各有三扇小门出口一排排木椅，可坐满 700 名观众，遇上卖座好片，两侧还可站立上百位观众，这里也是村民重要的活动地点。

中段有励志德学校，还有一个何碧山客，当年陈降、陈松兄弟与乡亲到沙巴做生意，机缘巧合下接教到何东山的三官大帝宫、当时许愿若生意顺利，将恭请“三官大帝”供村民膜拜求平安，果然一切如恩，大家生意蒸蒸日上，为坚守承诺，两兄弟与数先辈专程到安溪何碧山宫恭请来“三官大帝”香灰袋，先在财启

村福五供奉，后来香火鼎盛，才搬迁至福六的财启村口。¹⁹五十年代村民组织“乡村互助会”，彼此能及时提供协助，互助会深得村民支持，会员逐年增多。1968年互助会进行改组，由财启村的励正与励德两所小学的董事，建议从两所学校名字中分别取励正的“正”与励德的“德”为社名，正式申请注册，取名为“新加坡财启村正德社”。北段除了有一间广德学校以外，还有成邦、泗篱、兴合几个早期的垦殖园。村内的新芭位置是养殖区及蔬菜种植区，除了满足村民日常的需要以外，也对外销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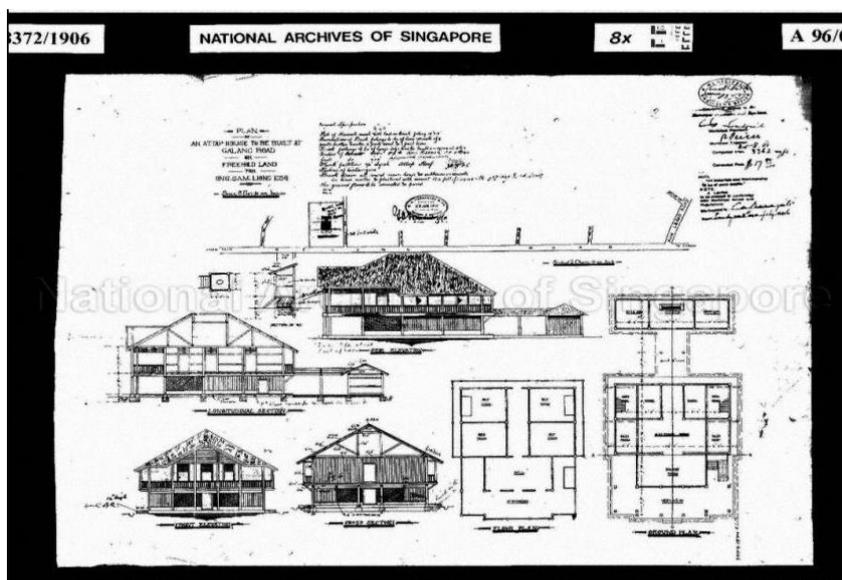


图7 亚答屋建筑图（1906年）

资料来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编号：8372/1906

早期的华人聚落内的村屋样式经历了几个演变的过程：（1）起初 1824 年，在莱佛士的市区规划之前，位于新加坡河南岸沼泽地的华人甘榜基本仿照马来人建造架离地面的高脚木屋，称为“浮脚楼”；²⁰（2）不同于市区华人所居住的砖造店屋，乡村地区华人住宅的建材及外观看起来则显得较为“马来式”。乡村地区马来人的传统住屋称为“亚答屋”，其房屋的建造多利用竹篾或木板为墙，并利用可以在新加坡当地取得的海岸红树林棕榈科植物的叶子“亚答叶”作屋顶，房屋地板以高架的方式架离地面 1 公尺以上，以使屋内通风干燥，防止潮湿、水患、虫害；²¹（3）乡村华人则仿照马来人就地取材，建造亚答屋作为住宅，但在

¹⁹ 黄耀天，《梦里家乡：财启村》（新加坡：Oxford Graphic Printers Pte Ltd，2018），页 68。

²⁰ 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页 17。

²¹ 郑资约编著，《东南亚地理志略》（台北：国立编译馆，1972），页 321。

建筑的设计上却与马来人不同，华人的亚答屋维持紧贴地面的传统习惯，并且多采用中式设计。²²（4）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亚答屋的建筑材料也逐渐得到提升，人们舍弃容易损坏漏水的亚答叶改以锌板片作为屋顶，而墙面也改用砖块、水泥等较为坚固的材质，取代原先的木板，以锌板作为屋顶的房子称为“锌板屋”，亚答屋或是锌板屋都是新加坡独立之初，乡村地区最常见的住宅形式。

3、聚落的时空演变

1951年义顺发生大火，烧毁了通益路对面的一排22间锌板店屋；1961年5月，恰好是新加坡的哈芝节，新加坡河水山大火开始燃烧，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在这场大火中，大概60英亩的面积被毁（面积相当于34个足球场），2800多所房子被摧毁，将近16000人流离失所。事实上，河水山在1961年大火前一年，已经发生过两次火患，不过都被居民抢救下来，没有酿成大祸。²³这场火灾是乡村聚落演变的重要转折点，政府意识到城市化进程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

1960年新加坡建屋发展局（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成立，是新加坡国家发展部下属的法定机构，作为政府职能机构负责新加坡居住新镇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刚成立之初，建屋发展局主要负责清理早期的占屋和贫民窟，同时以提供廉价房屋为目标，随后政府开始大力建设公共组屋。1964年开始，建屋发展局提出“居者有其屋”的计划，让新加坡公民都可以拥有自己的政府组屋。建屋发展局的另一成就是推行“城市重建”的计划，把旧的屋子拆掉，并在原地上兴建起高楼大厦，广植树木，改善居住的环境。

1977年，义顺区进入了新镇发展阶段。当时政府宣布实里达河以北907公顷的地段，主要包括财启村和华顺芭一带的土地，将被征用来发展四万单位组屋、中等入息公寓和轻工业区。²⁴从1977年至1980年初，财启村的徙置工作已经完成，村民多移居宏茂桥，饲养热带鱼的农户则迁往淡宾尼。到了1982年初，共860单位的组屋已经完工。同时，在居者有其屋计划下购买新镇组屋的也有652户，人口共4100人。义顺新镇也是新加坡第一个采用城市化概念建造的新镇。

新加坡独立以后，农业生产及港脚有限的工业逐渐吸引不到早期因人口增长而带来的众多劳动力；教育的推广、交通的便利则缩短了农村和市区的距离，加

²² 刘必权，《东南亚列国志》（台北：川流出版社，1981），页85。

²³ 《南洋商报》，1961年5月26日。

²⁴ 高立人博士（时任义顺区国会议员），《言论选录》，1983年9月11日。

上国家工业化政策的实施，给村民提供了向外发展的机会。曾经是这一带中枢的义顺港脚，在现代化的冲击下逐渐式微，人口开始迁动，商业活动渐渐冷淡下来，以往的热闹不再。而新镇的出现，加速了港脚告别其历史任务的步伐，开始了它的社会变迁。²⁵1980年代末，义顺地区的华人聚落从早期的传统村落形态逐渐完成了成为现代组屋社区聚落的时空演变。

四、结语：近代华人聚落——“甘榜精神”的摇篮

十九世纪中叶，在海外移民浪潮及莱佛士重商政策的双重影响下，新加坡实里达流域种植经济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加工工业及商品流通行业的快速增长，“港脚”日益繁荣，义顺地区迎来了开发高潮，移民垦殖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华族企业家们为保证劳动力的长期稳定，吸纳大量南下移民在靠近工厂与园丘的地方定居，这些政治、经济、历史、地理、人文等要素逐渐催生出早期华人聚落的形成。

近代义顺地区的华人聚落具备血缘、地缘、业缘、方言缘的多缘特征，兴利芭“潘家村”的“炉内潘”人聚族而居，建立了一个地缘、血缘和业缘三缘结合的新社区；漂洋过海的早期南下移民怀揣着对于祖籍地“祖神”的深深敬仰，各个族群纷纷设立庙宇宗祠以便存放族人的精神寄托，同时从传统的宗祠功能延伸到管理族群日常事务处理、经济运作、社区管理等诸多方面，伴随着时代的变迁，聚落的管理人又从初期的单一的庙宇形态增加到庙宇或宗祠理事会，甚至管理有限公司等多种现代管理模式。最终形成极具南洋华人信仰特色的聚落特征；华人移民注重教育的儒家传统观念，一批乡村华校为新加坡早期社会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名为公立，实则华商个人出资的典范华校也成为了义顺地区华人聚落的表征。1965年，新加坡独立前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李光耀政府的“居者有其屋”的政策引导，传统华人聚落终于在河水山大火过后逐渐演变成为现代化的组屋社区聚落形态。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有着浓厚的集体主义理念，儒家思想是一个价值体系，强调自我约束，规范个体行为和社会行为。儒家文化的根在乡村，传统的华人乡村有一套完整的教化体系，有私塾、宗祠、族长、乡绅和家教系统，这一系统是华族乡村道德养成和自治秩序的基础，最终诞生了“甘榜精神”，“甘

²⁵ 陈鸣鸾，〈义顺港脚百年沧桑〉，载《义顺社区发展史》，新加坡义顺区发基层组织、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馆编撰，新加坡：国家档案馆，1987年。

榜”是马来语，意即村镇中人守望相助、守护家园的传统，和儒家的家国、社区情怀并无二致。在倡导多元种族和谐、邻里关系和睦的当今社会，人们蓦然回头寻找那早已消失多年的“甘榜精神”。虽然作为“甘榜精神”的摇篮，曾经的华人聚落已经逐渐被人遗忘，但是我们仍旧期待“甘榜精神”可以世代传承。

【征引文献】

一、论著

王恩涌，赵荣，张小林等，《人文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刘必权，《东南亚列国志》，台北：川流出版社，1981。

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中文版）》，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3。

邹豹君，《马来亚地理》，台北：汉明书局，1965。

林孝胜主编，《潘家村史》，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1。

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

郑资约，《东南亚地理志略》，台北：正中书局 1972。

郑资约编著，《东南亚地理志略》，台北：国立编译馆，1972。

高立人，《言论选录》，1983。

梁德儒，《新加坡地理》，新加坡：大地出版社，1966。

梁德儒，《新加坡地理》，新加坡：大地出版社，1966。

黄耀天，《梦里家乡：财启村》，新加坡：Oxford Graphic Printers Pte Ltd, 2018。

H.W. Firmstone , *Chinese names of streets and places in Singapore and the Malay Peninsula* , Singapore: National Library Board, 1905.

二、档案馆资料

林源福，〈义顺社区发展概述〉，载《义顺社区发展史》，新加坡义顺区发基层组织、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馆编撰，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1987。

林源福，〈战前华顺芭的经济与社会〉，载《义顺社区发展史》，新加坡义顺区发基层组织、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馆编撰，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1987。

林源福、邬史昌，〈义顺区教育发展概况〉，载《义顺社区发展史》，新加坡义顺区发基层组织、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馆编撰，新加坡：国家档案馆，1987。

陈鸣鸾，〈义顺港脚百年沧桑〉，载《义顺社区发展史》，新加坡义顺区发基层组织、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馆编撰，新加坡：国家档案馆，1987。

曹宝弟，《战前星马黄梨业的探讨》，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荣誉学士论文，1976。

三、其他

《南洋商报》，1961年5月26日。

《横山庙理事会会议记录》，1957年3月31日、4月7日。

1969年9月，由当时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师生组成的华人村落调查小组曾在义顺社区的华人村落进行社会调查，并撰有调查报告（油印本）。

前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村史调查报告，如《绝后岛杨家村》等。